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科研简报

2011 年第 4 期（总第 32 期）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编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本期要目

特别报道

我院有 1 项科研项目入选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我院 3 名教师获 2011 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唐世平教授入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我院中标 201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成果简介·专著

成果简介·论文

国际政治系 (P 5)

政治学系 (P 8)

公共行政系 (P 11)

➤ 特别报道

我院有 1 项科研项目入选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近日，经教育部组织专家严格评审，我院 1 项青年基金项目获准立项，项目为：

姓名	项目名称
薄燕	合作的可能性: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研究

我院 3 名教师获 2011 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2011 年度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名单近日已公示结束，我院郑磊博士、刘淑华博士和沈逸博士获得资助。详情如下：

姓名	项目名称
刘淑华	智慧上海突发事件联动应急运作体系研究
沈逸	新媒体、跨国网络与国家安全:从“推特革命”到“互联网自由”
郑磊	面向社会管理创新的政府官方微博管理机制研究

唐世平教授入选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日前，经专家严格评审和面向社会公示，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结果予以公布，我院唐世平教授获得该项目资助，其项目为：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重点研究基地名称
唐世平	历史中的战略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	美国研究中心

我院中标 201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公布了 2011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评审结果，并进行公示。我院由陈玉刚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学术团队经过专家初评和会议答辩两轮评审后中标，中标项目名称为《国际体系变革与中国国际秩序观研究》，该项目也是本次复旦大学唯一的中标项目。

➤ 成果简介·专著

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

林尚立 肖存良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内容简介：统一战线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机制，是推进中国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统一战线与中国发展》从科学发展与国家建设的视角出发探讨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规律与发展方向，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内涵与体系结构，并阐述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存机理、发展脉络与内在合理性。

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

陈志敏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版

在国际关系多极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美国和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三大力量中心，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新三边关系——中国、美国和欧洲(欧盟)正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浮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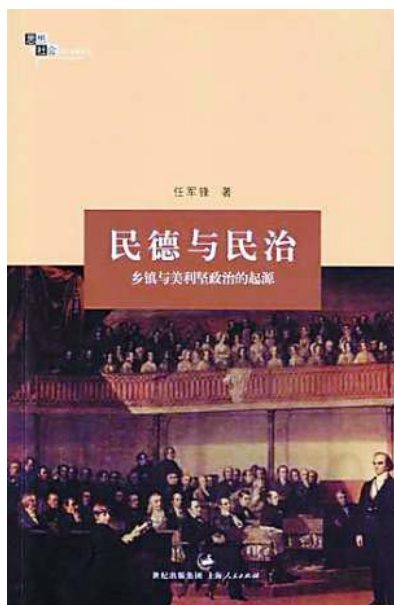
《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在战略三角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分析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框架，并深入到三边关系的各个方面，来充分展示三边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三边关系内部的四个主要向度，即三边政治关系、三边经贸关系、三边文化关系和三边战略关系；第二部分则研究中、美、欧在各个主要全球治理议题中的三边关系，涉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际维和行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国际金融体系的维持和改革、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非洲等七个案例。



民德与民治

任军锋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何为乡镇？在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为何如此热爱乡镇？当代美国和美利坚的政治文化与乡镇这种组织形式有何关联？在《民德与民治：乡镇与美利坚政治的起源》中，作者沿着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研究乡镇的从而理解美国社会的民主制度和民情的路径，将乡镇看作新大陆民众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美利坚社会的最基本因子，孕育整个社会的胚胎。它不仅决定了美利坚革命和政治的保守性，保证了美国社会在牢固宗教和社会纽带组成的有机整体之上建成，而且决定了这次革命的独特性，它并不来自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文本，而是来自乡民150年殖民地时期的乡镇生活经验。在乡镇，民主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

该书是作者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写就，除却对美国乡镇制度和乡镇精神的考察，作者还目睹了新英格兰乡民大会的实况，并完整翻译出了著名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有关乡镇研究的诸多通信和当时一些重要的法律文献，是了解美国乡镇生活和民主制度的佳作。

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刘志龙 竺乾威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是在复旦大学“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组对安徽A县的10项农村公共政策调查的基础上。将公共政策执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对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执行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并对改进中国农村公共政策的执行绩效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的亮点：首先在于其研究对象，课题组选择了10项典型的、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农村公共政策进行研究，这些政策包括：农业补贴、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城镇化、环境保护、养老、行政体制改革、农业科技、基层选举和土地流转政策；其次在于其研究方法，课题组采用了实证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掌握一手资料，从而能真实地将农村公共政策的执行现状与问题呈现给读者，《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可以作为中国农村公共政策研究人员和相关学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和数据检索资源。



国际政治系

《里斯本条约》后的欧盟政治发展

陈玉刚

国际观察 2011年第1期

《里斯本条约》改革的核心实际上在于政治层面。里约对欧盟进行了不少重要的制度创新和制度调整，主要包括：1、欧盟取代欧共体获得法人资格，成为唯一实体。2、新设了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俗称“欧盟总统”。3、调整了原先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新的高级代表俗称“欧盟外长”。4、欧盟委员会委员的数量将减少到成员国的三分之二。5、欧洲议会权力扩大了，成员国议会也被引入了一体化范围中。6、扩大了特定多数代表的表决范围，除非条约另有规定，理事会以特定多数议决。

从实际运行来看，欧洲理事会主席的职责规定比较虚，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首脑峰会并在它的层面上对外代表欧盟，二是就联盟重大的政治性方向问题发出一些声音，把握一体化的政治进程和方向。高级代表的职权则实得多，其上任第一件大事是组建欧洲对外行动署，而各成员国也围绕高级官员和驻外大使职位的分配展开了游说竞争。委员会主席的可见度相比则有所降低。在委员会与大成员国的较劲中，后者往往会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

里约改革使得原有的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分析范式面临挑战，国家与超国家的区分在新的欧盟中不再那么明显。把里约后的欧盟理解为一个超级国家，这种提法并不等同于超级大国，而是重在其管理的意义，可以指由许多国家组成的，管理幅员广阔、组织体系庞大、机构运行类国家化的区域共治体系。这种提法也许更能反映里约改革的真正意图。

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文化视角

陈玉聃

外交评论 2011年第3期（6月25日出版）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主要通过三条路径进行文化研究，第一条借鉴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强调文化是特定社会中一系列共有的价值、信仰、知识、目标、态度、行为规则等的总合；第二是通过权力来界定文化，强调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利属性了；第三是对文化外交的研究。从这三条路径中，我们看到一种可能性：将文化形式视为国际关系中的独立因素——而非权力、外交等传统概念的依附性因素——来进行具体的研究。

音乐作为国际关系中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其特点在于其高度抽象性的艺术性，超越国家、民族边界的特性和广泛的社会功能。它既可以为国家权力所利用，又充满强烈的国际性甚至普世性。

在国际关系中，音乐既作为工具，又作为本体产生影响。

作为一种工具，音乐主要有三种作用：首先，音乐被用来建构民族、国家等国际关系实体的认同。其次，音乐被用来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发挥“音乐外交”的作用。国家通过音乐宣传自己的形象；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或不便进行正式外交行动的情况下借助音乐交流

手段打开外交渠道；音乐本身还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礼物来维持国家间友好关系。最后，音乐还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方式来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理解、和平与合作。

音乐作为本体，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作用于国际关系。而音乐内容的影响，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是音乐对民族主义的作用，其二是音乐对国际主义的作用。

北极理事会与北极国际合作研究

陈玉刚，陶国平，秦倩

国际观察 2011年7月第4期

北极理事会是北极国家处理有关北极事务主要的政府间论坛，随着北极在全球视野中日益突出，该组织也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北极理事会的形成是北极地区国际合作发展的成果。历史上的北极合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关于北极科学与环境方面的合作协议。上世纪8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为北极国际合作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北极地区政府间合作的东一开始出现，主要成果是《北极环境保护战略》。1996年9月16日北极八国在渥太华举行会议，成立北极理事会。

在组织结构形态上，北极理事会把成员分为三类：正式成员（北极八国）、永久参与方和观察员。在组织宗旨上，北极理事会从原先的环境保护提升转变为可持续发展。

北极地区国际合作的发展促进了北极地区意识的兴起，无论是冷战结束前一些零星具体的合作，还是冷战结束后从北极环境保护战略到北极理事会的形成，都在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北极有着其地区的整体属性。这种整体感是以北极为核心，周围为边缘的一种地理观念的建构。但是另一方面，北极国家因领土和海洋争端产生的内部矛盾并未因此而消失。

北极的国际合作呈现出这样的发展趋势：北冰洋沿岸国家成了合作内核，试图形成某种主权联盟，共同在北极理事会内和国际舞台上宣示和强化其主权地位。在此基础上，借着北极理事会的平台，环北极八国一起建构北极的区域意识，营造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理念。

欧盟“双重民主赤字”问题与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中的参与

薛磊洁，陈志敏

国际观察 2011年7月第4期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议会先后经历了有限作用（1952-1979）、边缘化（1979-1993）、重新融入欧盟事务（1993-2001）三个阶段。《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正式赋予了成员国议会在欧盟中的一些权力，但主要集中在欧盟文件、提案的传达以及议会间合作两方面。成员国议会即使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其作用只是咨询性、建议性的，很难真正影响到欧盟的决策。

从代议民主的视角出发，欧洲议会存在着权力缺失和合法性缺失两个先天不足，欧盟存在着“双重民主赤字”问题，即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同时存在着“民主赤字”。

成员国议会的“民主赤字”主要包含两个层面。在欧盟层面，欧洲议会的权力和合法性缺失提出了成员国议会的“民主赤字”问题。一方面，和一个主权国家相比，欧洲议会的权力仍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欧洲议会的选举在欧洲政治中被认为是“次级选举”，其民主合法性基础一直存有疑问。在成员国层面，由于欧盟不是一般的国际组织，欧盟层面做出的决定、制定的规则、签订的条约都会影响到成员国的相关领域，但转型中的成员国议会缺乏对国家层面欧盟事务的有效参与。

就解决成员国议会欧盟层面的“民主赤字”而言，一种设想是在欧盟新设立一个由各成员国议会组成的欧洲参议院，另一种途径是通过条约赋予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中更大的权力。

就解决国家层面的成员国议会“民主赤字”问题而言，其解决路径则需要从“输入”和“输出”两个维度入手。“输入”是指成员国欧盟政策的形成过程，是从成员国到欧盟的向上过程；“输出”是指欧盟法律和政策在成员国的移植过程，是从欧盟到成员国的向下过程。

美国网络战略“魔盒”搅乱世界

沈逸

人民论坛 2011年8月20日

美国的新互联网战略提出了“用炸弹惩罚黑客”的逻辑。如果允许单一国家凭借自己的判断，用非对称手段来还击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黑客袭击，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怎样？

美国这一新战略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削弱和动摇中美战略关系稳定基础的战略互信。美国颁布的战略将来自特定国家的黑客袭击视作“政府资助的行为”，还有可能依据冷战思维进行“有罪推定”，这将从两个方向恶化大国的战略互信：一方面，美国国内的人士可以通过炒作来自中国的“威胁”来营造和凸显中国政府的所谓“敌意”；另一方面，美国公开在“互联网自由”战略的指导下，可能从技术、资金以及外交、政治等方面，支持和资助某些公开宣称以“颠覆中国政府”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鼓励私营公司挑战中国的国内法律。

其次，增加偶发事件升级、恶化乃至擦枪走火的可能。美国新版的战略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两国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反而使冲突变得更加容易：分派两个黑客，一个到中国，一个到美国，然后交互攻击一下，只要成功诱导双方相信攻击源自对方政府授意，危机可能于不经意间发生。

最后，为中美两国的冲突控制等提出了新的议题。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将信息空间的这种行动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美国的新互联网战略有些类似要打开一个潘多拉之盒，它将成为考验多方政治智慧和勇气的试金石。

政治学系

团结与民主：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中的地位和作用

林尚立

《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5期

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赋予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是：团结与民主。

在统一战线以及建国的实践中诞生的人民政协，始终具有双重属性，即统一战线组织的属性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属性。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人民政协的建设和发展，能够产生三重效应：一是提升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二是实践人民民主，推进国家一体化与制度化建设；三是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有机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双重属性和三重效应，使得中共通过热敏政协，既能在统一战线的逻辑上联合各方力量，团结全体人民，同时也能在人民民主的逻辑上联合各方力量，团结全体人民。基于此，以统一战线为精神，以人民政协为载体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很自然地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时支撑着党的领导和执政。

人民政协创造团结与民主有机统一的政治局面，核心机制就是政治协商，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政治主体力量，共商国事的大政方针。从民主生活的政治逻辑看，协商是在、人民实现在我管理的最基本形式，是民主的基础，需要高超的人类理性实践。民主的其他形式是对协商的替代或补充。所以，人民政协力图从政治协商开发民主、创造团结的政治实践，既是一项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实践，也是一项高级的政治探索和实践。

统一战线、人民协商和协商民主，是相继而生的，其逻辑起点是各方力量的联合和人民的凝聚，而其相继发展的取向则是人民民主，即不仅要在价值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且在制度上和机制上落实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协是承前启后的，它既承载着统一战线的使命，又承载着实践协商民主以落实和推进人民民主的使命。

当代中国治安体制与国家政权建设

陈周旺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11年6月25日第三卷

当代国家理论甚为关注现代国家与治安体制之间的本质联系，并将治安体制的建立定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党重新界定阶级斗争的内容，从治安管理角度界定了国家职能的内容。

中国正面临在新条件下如何重新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治安管理的问题，即由片面强化国家专制权力，转化为承认和鼓励社会力量的成长，通过治安合作机制的创新，构建出一种自主、平等、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第一，重新定位基层治安机关的职能，从“严打”政策的片面强化打击力度转变为“推进社区警务建设”，在体制上体现为还原基层派出所的职能。第二，让基层治安权重新回归社区，创建社会治安多元合作机制。首先，参与社会治安的主题更趋多元化；其次，针对不同的治安参与主体，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再次，传统治安联防队伍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由于社会力量的生长，以国家为中心的治安体制逐渐向多元合作的治理机制转变，这一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国家政权建设正逐渐走向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相互依存与治理合作的道路。

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修复机制

刘建军

文汇报 2011年7月4日

我们把修复和创新界定为一种能力，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秉故与纳新所构成的坐标系中，具有固守经典传统和开发新型动力的力量，使中国的发展能够在由创新力和修复力组合而成的区间进行伸缩和调整。

创新力意味着突破传统约束、吸收新型要素的能力。改革开放时期，创新力体现为对传统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

修复力指面对挑战的时候，一个政权具有快速回复到其原初制度安排的能力以及保持这一状态的期望。对于中国而言，政党修复力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能偏离经典的社会主义轨道，也不能背弃经典的社会主义价值。

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首先，其创新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意识革命模式中国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化。其次，中国共产党修复力的目标在于把握创新的空间与力度，更多的表现为捍卫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主要是通过对制度边界和意识形态边界的守护体现出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历程中，创新力和修复力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暗含的一个总趋势是：创新力越强，对修复力的要求就越高；创新力展开的强度越大的时候，修复力的反哺程度也就越高。

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

林尚立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年7月10日第4期

决定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一个因素是贯穿至今的，即其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的有机统一。

中国在近代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坚持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同时，开创了“党建国家”和“人民共和”的国家建构模式。党建国家，其理论和实践始于孙中山，强调以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为轴心，凝聚民众、整合社会、支撑国家，以推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实现平稳有序的转型和发展，建立现代制度体系，发展现代化。人民共和，其理论和实践萌芽与辛亥革命之后，成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强调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现人民在主权和人权上的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获得自主和平等的发展，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社会、新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历史来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共和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才能从边缘走向中心，从而成为全民族的核心力量。也只有通过“人民共和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才能使其所建立的新社会、新国家真正成为人民自主和解放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也与生俱来地具有双重使命，其一是增强党的力量，巩固党的领导；其二是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社会协调与国家整合。作为国家机制的统一战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二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孕育和发展的“协商民主”，第三是协调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内化成国家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当今中国内在协调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系于统一战线。

民主程度与政府质量：文献回顾与评论

何俊志

国外社会科学 2011 年 7 月 15 日第 4 期

民主化浪潮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内战、分裂、经济停滞、效率低下和腐败盛行等。“民主政体”究竟能否提高征服质量，并给民众带来幸福的生活？

在新兴的和老牌的民主国家中，政治正当性建立的基础，并不主要依赖于“起点”上的选举程序所产生出来的代表性，而是更多地来自于政府质量所产生的政治绩效。

在线性模型探索阶段主要是以腐败作为政府质量的测量指标，尝试在民主与腐败之间建立某种线性关系。这些模型能够在总体上解释民主程度与腐败程度之间的大体趋势，但在统计学上显著不足，同时难以解释 20 世纪后期在一些国家步入民主国家行列之后腐败大增的现象。

在超越传统线性思维建立新的模型方面，蒙蒂诺拉和杰克曼首先提出了 U 形曲线模式，宋的研究得出了 S 曲线模型，巴克和汉德尼尔斯解释了 J 型曲线模式。三种曲线都承认：民主经历越久，政府质量就越高。基弗及随后沙朗和拉普恩特的研究进一步建立了条件模型，即使在民主政体下，民主对于政府质量的提升也是有条件的。

从文献回顾中我们发现，民主转型的起点至关重要。首先，转型起点的制度设计、完善程度和具体制度类型，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转型之后的政治运作和政府质量。其次，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转型的起点位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更高阶段上，可能会更快更好地带来民主深化与政府质量的同步提高。

公共行政系

Outsourcing: Rebuilding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in China

敬义嘉

Innovative Trends in Public Governance in Asia 2011 年 2 月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has been producing a market-based government. Outsourcing in service delivery has been increasingly adopted as a major public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tsourcing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 changing service delivery environments in China and generalizing the major develop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outsourc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apacity development is proposed to examine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Chinese governments on outsourcing. A case of competitive outsourcing of social service in Shanghai is studied as China's avant-garde local innov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in service delivery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trend in China, with important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Chinese governments to develop managing capacities to achieve success in harnessing this "buy" option.

论行政伦理两难的成因

李春成

中国行政管理 2011 年第 6 期

现代行政伦理两难的成因很复杂，有规范层面的也有资源层面的，有理论观念的也有法令规定的，有浅层的也有深层的，有行政系统内部的也有外部社会的。主要成因可以归为深层原因和直接原因两类。

深层原因有两种。第一是终极善的冲突。柏林认为，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着多种自由、价值和善，总会产生一些冲突和矛盾。在同一价值、自由和善的内部也包含着一些冲突的因素。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第二是基本价值矛盾。对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三位一体口号，一方面其本身就是充满歧义和矛盾的，另一方面这些基本价值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并可能互相损害。

直接成因有三种。第一是资源限制。行政资源（人力、财力、时间、空间、行政能力等）都是有限的，这常常导致行政行为人无法同时充分履行他们本应履行的却又不相容的行政道德义务、无法同时实现理应同时实现的诸种不相容的价值。第二是规范竞合。不同类型的规范可能会提出不相容的行政义务和行政品德，同一类型不同种类的规范也可能对行政行为人提出相互矛盾的义务和品德，对同一实践的不同道德评价路径或思维方式也会引发行政道德冲突和伦理两难。第三是主体因素，包括规范认同、价值认同、角色认同和能力构建四个方面。正式主体主观因素的介入，使得行政伦理两难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充当行政伦理两难的转化枢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行政伦理两难。